

地名的 秘密

——汉语地名外译研究

**Behind
the
Name**

Chinese
Place Names
in
Translation

周薇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地名的 秘密

——汉语地名外译研究

周薇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名的秘密：汉语地名外译研究 / 周薇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0
ISBN 978-7-5201-5527-4

I. ①地… II. ①周… III. ①汉语-地名-译名-研究 IV. ①H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98416 号

地名的秘密

——汉语地名外译研究

著 者 / 周 薇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张 萍

文稿编辑 / 李帅磊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6.5 字 数：227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5527-4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周薇老师写了《地名的秘密——汉语地名外译研究》一书，想请我为她写个序。

她的这部论著横跨语言学、文学和翻译学三个学科，探讨了文学作品（当然也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既包括外译中，也包括中译外）中的专有名词翻译策略，对我们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工作有着理论上相对的参考意义和实践上具体的策略意义，对我们大力弘扬和译介中华文化的战略性工作也有一定的价值。

我是做法国文学的研究与介绍工作的（平时做得最多的，还是法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不是地名研究方面的行家，对汉语地名的外译问题没有太多的思考，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但是，我好赖曾当过周薇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而她的这部论著恰好是在她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盛情难却，于是，在此，我就这一话题写上一二。

地名，它不单单是我们人（首先是祖辈）对某个地方（他们居住或看到的地方）的一种称谓。它不仅是一个地点，还是地方与人之间的一种联系方式，它是有灵性的，也就是说，它是有着丰富的人文意义的。

地名几乎与语言同时产生，一产生，也就有了“音”和“义”。很多地名来源于当地的自然景观、经济特点、文化传统、宗教因素、民族习惯，甚至神话传说，它的文化意义，无论在高雅的层面上，还是在通俗的层面上，都是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的。

一个地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它的变化，也往往蕴含着那个地方以及住在那个地方的人们所经历的历史沿革……

这几年，我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李辉等文化研究学者的“地名古今”，那是网上的一个公众号，专门关注地名中的文化问题。其中“行走天下”“回家的路”“我说地名”“倾听讲述”等专栏中的文章，我也很关注，读了不少。

记得几个星期前，我去上海，住在淮海中路边上。淮海中路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几乎与南京路齐名，有种说法是：“如果说南京路是上海商业的象征，那么淮海路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品位、一种风格。”（百度百科）历史上，淮海路经历了好几次改名。据悉，淮海中路辟筑于1900年，最早叫宝昌路。而这“宝昌”，本是法租界公董局总董宝昌（Paul Brunat）的名字。同时也叫勃吕纳路。而勃吕纳，正是法国姓 Brunat 的音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15年6月，法租界公董局决定，以大战时法国元帅霞飞（Joffre）之名更名为霞飞路。抗战期间的1943年10月，又一度改名为泰山路；而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1月，又改称“林森中路”（林森，曾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1943年逝世）。1950年5月为纪念淮海战役的胜利，改名为“淮海中路”。一条路，名称的更改，其中包含的历史含义，与当时的国情民情不无相关。

我记得，我少年时期的十余年岁月，居住在宁波市的县西街。它位于当时的宁波市市政府的西侧，那时候，市政府不叫“市人民政府”，而叫“市人民委员会”，简称“人委”。“人委”的东侧叫“县东街”，前面叫“县前街”，西侧叫“县西街”。小时候我有些纳闷：宁波已是一个市，市府前的街应该叫“市前街”，怎么会叫“县前街”呢？殊不知，当年建府筑街时，应该还没有宁波市这一行政区划，我从网上资料查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夏代，宁波的名称为“鄞”。后来，长期称为明州。明朝时，为避国号讳，朱元璋采纳鄞县文人单仲友的建议，

取“海定则波宁”之义，将明州府改称宁波府。宁波之名沿用至今。民国时，1927年划鄞县城区设宁波市，1931年撤宁波市，复入鄞县。1949年5月浙东解放，鄞县城区建置宁波市。如此想来，所谓的县东县西，当指鄞县县府之东与之西了。记得“文革”时期，大兴破四旧改街名之风，县东、县前、县西三街一度更名为“立新街”。我家的地址遂由“县西街42号”变成了“立新街124号”。再后来，城区改建，市政府前几条街统统拆掉，改为一大片绿地。“县西街”这一街名随之“寿终正寝”了。

还是回来说一下汉语地名的翻译问题。

说到地名的翻译，当然是有最基本的规则的，我们国家制定的规则是音译，而非意译。无论是外译中还是中译外，无论是人名的翻译还是地名的翻译，都是如此。

记得20世纪80年代，国内翻译界讨论外国科学家、文化名人名字的翻译时，定了四方面的原则：名从主人，约定俗成，尊重规范，服从主科。后来，新华社的译名室又增加了几个原则：音似为主，形似为辅，同名同译。

要强调的是：地名的翻译，也大致上参照这些原则。无论是外译中还是中译外，概莫能外。

当然，这些都是原则上的做法，但原则的规定是要让人们有个规范。而规范，在很多情况下是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尤其是地名（人名也一样）中很多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中完全丢失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总认为，有些地名（我指的是，该地名本身就包含相当的文化含义）的翻译，则一定要考虑其中文化含义的转达和历史沿革的反映。这一考虑，虽与有关权威部门提出的“规则”相悖，但有着更多的人文情怀。

手头有几个外国地名的例子：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好空气的地方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富有的海岸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富饶的港湾

Côte d' Ivoire 科特迪瓦——象牙海岸

在官方认定的“音译”中，地名本身的意义完全没有了，一般的中国读者很少会把“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音译的含义与“好空气的地方”相联系；也很少有人会把“阿根廷”（Argentina）这个国名，与“白银”这一矿藏和银白色挂上钩。

可能也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的一些老翻译家，在翻译外国地名的时候，有意识地在“音译”中特地使用了意境很美的汉字，使得那些外国地名在中国读者的心中保留了一份优美，一份雅致，如：

Champs-Élysées——香榭丽舍

Fontainebleau——枫丹白露

我这里举的例子多为“外译中”，而“中译外”的例子，此刻我想举我在北京的家的地名：“蒲黄榆”。按照有关规定，翻译成外文之后，“蒲黄榆”这一地名就成了“Puhuangyu”，该地名中原先含有的“蒲”“黄”“榆”三种植物的含义消失了。“蒲黄榆”三个字所包含的地名中的历史沿革更是无从追寻。

要知道，“蒲黄榆”这个地名是有来历的。北京著名的文人，生前居住在蒲黄榆一片的汪曾祺曾写有一篇文章《蒲黄榆后记》，记录了地名“蒲黄榆”的由来。说的是：曹禺有一次为一件事打电话给汪曾祺，顺便问起：“你住的地方的地名怎么那么怪？”汪曾祺则回答说，他搬来之前也觉得这地名很怪：“捕黄鱼？——北京怎么能捕得到黄鱼呢？”后来他经过考证才知道，“蒲黄榆”是一个三角地带，是三个旧地名的

缩称：“蒲”是东蒲桥，“黄”是黄土坑，“榆”是榆树村。这犹之“陕甘宁”“晋察冀”，不知来历者，自然会觉得莫名其妙。而翻译为“Puhuangyu”之后，其名之妙，便追寻莫得了！

回头再来说说这部论著。

周薇的这部论著《地名的秘密——汉语地名外译研究》，以她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又经过了相当程度的修改，体现出作者对这一问题的长年以来的学术性思考。

这部著作所讨论的，是“在实际应用中，汉语中的地名如何外译”的问题。在这部论著中，作者周薇提出了这样的一些问题：“是什么造成地名译名的多样性？”“与西文地名相比，汉语地名是否有自己的特点？”“汉语地名的对外翻译能否体现出自己的特点？”“怎样的翻译可使汉语地名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提出问题，是我们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如何迈出这第一步，需要对相关话题有综合的了解，对前任的研究成果有全面的把握与中肯的评价，从这一点来看，周薇的这部论著是做到了。

提出问题固然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但是，汉语地名的翻译问题应该可以从很多层面来讨论，种种新的问题还会在时间中产生。

我认为，论著中的最精彩部分是在“影响汉语地名外译的因素”方面的考量，包括“文本的影响”“语言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国力的强弱”“译者的选择”等方面，其中，不仅充分体现出作者周薇的个人思考，而且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思考，文化含量很高，这样的思考，对我们国家有关方面制定与修改切实可行的“地名外译”方法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在我看来，论著还有很多方面有待提升。例如，论著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小说《灵山》为个例来做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这代表性中有很强的文学含义、文化含义，但如果能把

《灵山》与另一些经典名著互相交替对照，一定会取得更佳的效果。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另外，由于周薇本身职业经历的原因，书中的研究基本局限于汉语地名的“法译”上，如能有更多其他语言的“外译”例子作为佐证，则就锦上添花了。

《地名的秘密——汉语地名外译研究》这部论著对“汉语地名的外译研究”只是开了一个头，但是，我们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开端，希望周薇还有周薇的同行，能把这方面的研究继续下去，在更多的问题上取得更新的进展。

话又说回来，对一部书稿，学术意义上的事，自应由学术圈内的人士来探讨，我等学术圈之外的人，大概只有看到“一叶”的能耐，却无看破整个“森林”的本事。以上所写无非只是与话题有关的一些随想，目的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就此促使学术圈内外的读者对“汉语地名的外译研究”这一问题引起兴趣，更希望行家多多关注这一话题，同时也能对周薇的这部著作做出中肯的批评。

是为序。

余中先

于北京蒲黄榆寓中

2019年9月初

前 言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地名，主要是汉语地名，研究重点是汉语地名对外翻译的问题。表面上看，地名的翻译规则相对简单。汉译外时，联合国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均认可汉语拼音是各种拉丁字母文字转写汉语地名的标准。外译汉时，解放之初就有新华社译名室以“辛华”为笔名出版的工具书和译名手册，之后又有了《世界地名翻译大辞典》（周定国）等辞典的问世，为地名汉译提供了参考和工具。按理说，地名翻译应该是整齐划一的，但我们会发现，出现在眼前的译名，不论汉译外还是外译汉，形式都是非常多样的。

那么，中西方对于地名的认识，或者范围更广一些，对于专有名词的认识是否一致？汉语地名相对于西文地名是否有自己的特点？汉语地名外译时有哪些可能的译法？如何归类 and 评价这些翻译方法？哪些因素会影响汉语地名外译方法的选择？如何在翻译时体现汉语地名的特点并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本书希望通过回答以上问题，为汉语地名外译构建一个可行的翻译参考模式，促进汉语地名的对外传播，同时也为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做出贡献。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汉语地名外译的研究现状	2
第二节 本书的分析语料——《灵山》及其法译本	8
第一章 中西方的专有名词	21
第一节 西方的专有名词：指称与涵义	21
第二节 汉语的专有名词：“名”与“实”	25
小 结	29
第二章 汉语文化词的外译	32
第一节 汉语的专有名词与普通名词	32
第二节 汉语文化词的翻译方法	34
一 替代译法	35
二 逐字对译	41
三 解释/描述法	48
四 音译	54
五 语级调整	58
六 他国新名	60
小 结	62

第三章 汉语地名的外译	65
第一节 地名翻译的特殊性	66
第二节 汉语地名的翻译方法	70
一 音译	70
二 通名现出	79
三 加译	100
四 加注	102
五 逐字对译	110
六 音译加逐字对译	129
小 结	138
第四章 影响汉语地名外译的因素	141
第一节 文本的影响	143
一 按发音翻译	143
二 按字面意思翻译	147
三 按指称物翻译	148
四 小结	150
第二节 语言的差异	151
一 中西方的按发音翻译	152
二 汉语拼音方案	159
三 地名中的通名	162
四 有涵义的专名	170
五 小结	173
第三节 文化的差异	174
一 法语的“音”	175
二 汉语的“字”	178
三 名之灵	183

四 小结	189
第四节 国力的强弱	191
一 佛经翻译与遣唐使	192
二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播”	194
三 “和制汉语”与“一名之立，旬日踟蹰”	198
四 小结	205
第五节 译者的选择	208
一 译者的能力	208
二 译者的感受	211
三 译者的信心	212
小 结	215
结 语	218
参 考 文 献	223
附录一：2000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新闻公报	235
附录二：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关于中国地名拼法的 决议	240
附录三：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	242
附录四：美国国会图书馆关于汉语拼音断词问题的回答	246
后 记	249

以色列文化学者埃文-佐哈尔 (Even-Zohar) 从文化研究角度提出多元系统论假设, 认为翻译文学通常处于目标文化中的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 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也会占据中心位置。张南峰根据这一理论进一步将翻译与文化认同相结合, 认为“在不同时代提出的不同翻译主张……与不断变化的文化自我形象有一定的关系”(张南峰, 2015: 91), 并进一步阐释: “近一百年来, 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到‘文化大革命’, 再到经济腾飞, 中国主流文化的自我形象, 可说是从谷底逐步攀升。五四时期, 鲁迅主张以翻译来改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今天, 则有论者主张以翻译来改造英文。翻译目的的这种 180 度转向, 反映出自我形象的戏剧性变化。中国文学走不出去, 从无人理睬到引起广泛关注, 看来也是自我形象提升的结果。”(同上: 91) 将翻译态度同国家自我形象认同感相结合, 我们认为是有道理的。

近年来, 随着各方面实力不断提高, 自我形象认同感也越来越强, 中国也越来越寻求在文化上的国际话语权。2013 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 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①。2015 年 12 月 13 日,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出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作会议时强调, 要“对外阐释好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和世界意义, 阐释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①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2013 年 8 月 19~20 日) 上的讲话, 北京。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szxt/qgxcsgzhy/index.htm。

的制度优势和发展成就，阐释好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及其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引导国际社会全面客观认识中国，塑造中国良好形象”^①。

在如今这种对外传播的大背景下，在全球新的舆论格局中，我们的翻译工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输出。这种输出不能仅仅依靠国外翻译家的翻译成果或经验之谈，也需要我们自己对此有一个系统的认识，给出明确的方向。真正的自我形象认同既不会妄自菲薄，也不会妄自尊大，而是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因此，要想“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国际社会全面客观认识中国”，既需要清楚认识外国，更需要清楚认识自己。只有了解别人才能给自己更准确地定位，只有了解自己才能构建符合自己情况、自己利益的话语体系。研究汉语地名的对外翻译无疑可以放在这一背景中，通过合适的地名外译，展示我们的文化身份，准确、有效地传播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为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做出一定的贡献。

第一节 汉语地名外译的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汉语地名外译的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大类：标准类、工具类和分析类。

标准类即国家制定的标准或法规。我国于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10月31日颁布，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章第十八条规定：“《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该法规为汉语拼音转写汉语地名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具体转写方法方面，早在1976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

^① 《刘奇葆出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作会议》，http://www.gov.cn/xinwen/2015-12/13/content_5023329.htm。

测绘总局就制定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1984年，中国地名委员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国家测绘局又联合制定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见附录三）。1996年，国家技术质量监督局发布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6159-1996），其中规定：“汉语地名按照中国地名委员会文件（84）中地字第17号《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的规定拼写。”也就是说，1984年的《拼写规则》正式被列入国家标准，为汉语拼音转写汉语地名提供了方法标准。

不过，虽然有标准作为依托，但使用汉语拼音时，在分写连写、通名翻译等方面仍然有一定的模糊性，这些在本书第四章有具体分析。此外，这种方式也无法传达关于地名名称以及地名所指的任何涵义，在很多实际翻译中并未被优先采用。

工具类是指以工具书作为成果的研究。汉语地名外译方面的工具书并不多。首先是1977年以“严地”为笔名出版的《汉语拼音中国地名手册（汉英对照）》（测绘出版社）。手册中分别列出汉字地名、该地名汉语拼音拼法以及其英语译名。对于有通名的地名，英语译名采用的是专名部分使用汉语拼音、通名部分意译的方法。该手册共有三版，而最新一版也要追溯到1982年。2016年出版了《英汉汉英中国地名词典》（余富林，张立丽），“收录的地名包括中国县市和县市以上的全部地名，以及部分重要乡镇名、部分重要自然物名（山河湖岛等），部分美称、别称、古称由于常用，也收入了本书”。另外，由于香港特殊的历史文化渊源，1999年出版的《香港地名词典》（樊桂英等）收录了香港的地名及其英文译名。

词典类工具书会适当考虑地名所指的类别，在翻译方法上会意译地名中的通名部分，不过，专名部分通常仍采用汉语拼音拼写，无法传达出地名之专名部分的涵义。另外，此类工具书虽列举详尽，但主要考虑的是行政区划地名，《香港地名词典》会关注到街区等更小的地点，但毕竟所涉范围仅及香港。此外，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虚构地名也不在

这些工具书的考虑范围。

分析类则是指专门研究汉语地名外译的论述。这方面论文比较多，专著方面仅有2018年刘连安等所著的《地名拼写译写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地名拼写译写时意见仍不统一，有的主张全部使用汉语拼音，有的主张通名意译，有的主张专名中表示方位等词意译，也有的主张全部意译等。

论文方面，通过中国知网的数据库检索可知，自2007年、2008年开始，关于地名翻译的论文数量显著增加，不过探讨外国地名汉译的论文数量一直远多于汉语地名外译的论文。

最早研究地名翻译的论文也是从外国地名汉译开始的。如曾世英的《统一外国地名翻译的商榷》（1956），周有光的《地名译音工作的革新》（1959），王超尘的《谈翻译人名地名的转写法（上、中、下）》（1965）等。直到1980年才有王岷在《浅谈地名标准化及其翻译问题》中将外国地名汉译和汉语地名外译放在一起，提出地名翻译应当标准化，汉语地名外译应遵循汉语拼音拼写法。

研究汉语地名外译的论文按照主要内容可分为三个方向：其一，偏重指出问题。如区锜在《中国近代史人名地名的翻译》（1986）中提出，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外文文献中出现的中国近代史的人名、地名非常混乱，回译时困难重重；张金福、吴兰在《中国地名翻译混乱的成因分析》（2015）中，以江西“庐山”英译为例，分析了地名英译混乱的原因；杜兴杰在《对等原则视角下浅析中国地名英语翻译问题》（2017）中认为中国地名翻译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提出地名翻译时应将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相结合的原则。其二，偏重提出建议。如陈小凡在《旅游地图土地名景点名翻译问题》（1988）中提出翻译景点名称时，重要景点名音译加括号意译、一般景点名意译、一般地名音译等建议；陆云在《谈〈枫桥夜泊〉中“寒山寺”的英译——兼谈人名、地名的翻译》（1998）中提出人名、地名并不都是无意义的代号，一概音